

论斯宾塞诗歌中的时间和农事*

陈 红

内容提要 斯宾塞在《仙后》中赞扬以农事为代表的一切艰苦卓绝、持久不懈的劳动，传达了一种“农事精神”，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田园牧歌所蕴含的田园旨趣大相径庭。出于英国殖民者的政治立场和经济利益，斯宾塞希望用诗歌来促使决策者重视农业生产中蕴藏的时代先机，完成帝国振兴大业；他于作品内外力主推进的爱尔兰殖民地土地管理改革计划，在如愿帮助英国获取帝国崛起所需的资源和财富的同时，也对爱尔兰的社会和环境造成了不容抹杀的灾难性影响。

关键词 斯宾塞 农事精神 殖民政治 爱尔兰

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以《牧人月历》（*The Shepheardes Calender*, 1579）开启其诗歌生涯，被同时代诗人迈克尔·德雷顿（1563—1631）尊称为“英国头号田园诗人”^①；此后的史诗《仙后》（*The Faerie Queene*）^②则被视为其文学艺术成就的巅峰。斯宾塞所处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是英国文艺复兴的鼎盛期，生活在其中的斯宾塞一方面深受荷马和维吉尔等古典诗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从乔叟等本土诗人那里吸取营养；其诗歌在承继古典传统的同时，显现出鲜明的本土化风格和个人特点，其中对时间的理解便同时映照出前辈诗人的思想光辉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国自然诗歌传统与当代生态诗歌的兴起研究”（16BWW039）的阶段成果。

① See Michael Drayton, “Michael Drayton (1619)”, in Bryan Loughrey, ed., *The Pastoral Mode: A Caseboo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4, p. 37.

② 《仙后》1590年第一版仅包括前三卷，1596年的第二版增加了后三卷，并对第一版内容做了少许改动。1609年发表的《无常篇》（“the Mutability Cantos”）实为第七卷中的两章，肯尼思·罗斯把《无常篇》在斯宾塞身后发表这一事件称为“无解之谜”（see Kenneth Cross, “Iconoclasm in Book 6 and the Mutability Cantos”, in Mihoko Suzuki, ed., *Critical Essays on Edmund Spenser*, New York: G. K. Hall, 1996, p. 272）。

与斯宾塞时代的文化特质，亦反映出诗人在两者间所做的努力调适。不少学者都认识到了时间概念在斯宾塞诗歌中的重要地位，并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①

斯宾塞所处的十六世纪后期正是英国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起步阶段，在近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推动下，人们的时间观念从此发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变化。也是在这一时期，英国越来越多的土地因为羊毛工业的兴起而改变了原有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土地所有者或佃农的劳作远比古典农事诗所描写的更具强度亦更有效率；而与此同时，回避乡村现实的田园诗歌大行其道。在安东尼·洛看来，斯宾塞的诗歌无疑表现出一种与田园旨趣大相径庭的所谓“农事精神”：代表“田园式纯真”的野蛮人因不事耕作而受到指责，黄金时代的价值观因上帝施加于人类的诅咒而被彻底颠覆，只因上帝的诅咒已然促成了新时代应提倡的劳动美德。^② 塞申斯也关注到了斯宾塞诗歌中的农事元素，指出诗人把广义的农事（georgic/husbandry）即劳动（labour）与时间相联系，把劳动视为拯救时间从而改变历史的“唯一的英雄方式”（see “Spenser’s”: 237）。

无论是泛指劳动还是特指的农事劳动，它们均与时间概念一起构成了斯宾塞的思想重点，在其主要作品中都有迹可循。劳动观念与时间概念共存于诗人心中，携手催生诗人有关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以及诗人对时代与社会的期盼。当然，对斯宾塞而言，劳动与时间都绝不仅仅是受困于宗教信仰或文化传统的内在的思想观念，也不仅仅作为文学表达而存在；它们还在最根本的物质层面及现实意义上与斯宾塞的政治身份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事实上，一旦我们关注到由斯宾塞的时间概念所决定的劳动观念，便可以发现诗人如何借助于以农事精神或农事伦理为核心的新价值观，实现他对诗歌传统和诗人职责的双重改造。此外，由于时间和劳动在斯宾塞的作品内外都被打上了基督教思想以及殖

^① 南希·林德海姆认为，斯宾塞把本不属于田园诗歌的时间概念引入《牧人月历》，建立了一个“反田园”的“时间方案”（see Nancy Lindheim, *The Virgilian Pastoral Tradition: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Modern Era*,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38）。刘立辉分析了《仙后》中包含时空观念的宇宙观，重点探讨了宇宙时间在其中的表现，并明确地把诗人的宇宙时间意识归于基督教“末世论”的影响（详见刘立辉《“末世论”与斯宾塞诗歌中的宇宙时间观》，载《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34-43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末》”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刘立辉《宇宙时间和斯宾塞〈仙后〉的叙事时间》，载《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第120-128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宇》”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威廉·塞申斯则在《仙后》中观察到，斯宾塞通过把维吉尔的时间观与彼时英帝国的政治文化意识相结合，带来了“对历史时间的新启示”（see William A. Sessions, “Spenser’s Georgics”, in *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10.2 [1980], p. 204.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Spenser’s”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See Anthony Low, *The Georgic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43-5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Georgic”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民政治的深刻烙印，我们更能借此看清，斯宾塞对以农事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宣扬实际有着不可否认的政治目的，且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后果。

一、斯宾塞的时间观念

古希腊人的时间观与基督教时间观是西方思想及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对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时间观有着重要的影响。古希腊人对时间的认识可以用循环观来概括。许多古希腊思想家持有“强烈的循环时间观”，他们惧怕时间的毁灭，希望借助对宇宙大循环和万物轮回的信仰，实现“对死的抗拒与对永恒和不朽的追求”。^①这种强烈的时间循环观有着反历史的倾向；它虽然不能代表古希腊时间观的全部，但的确在古希腊思想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与此相反，基督教文化继承了犹太思想中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其教徒坚信基督诞生及末日审判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因而他们的时间观同历史循环论基本上水火不容，是一种“对未来有所期待”的线性时间观，也称“单向时间观”。^②

这两种时间观与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思想之间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即便它们在欧洲文艺复兴的舞台上正式展开角逐，它们也能彼此妥协，比如斯宾塞就对二者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研究者认为，斯宾塞诗歌中的时间描述一方面“典型地体现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时间观”，另一方面又“深受[基督教]‘末世论’思想的影响”（详见《“末”》：35）。后者主要来自圣奥古斯丁。早期基督教盛行的“末世论”常与循环论为伴，人们相信，即便自己能够最终获得永恒和幸福的灵魂，也必“在时间的轮回中不断重返悲惨和辛劳”^③。奥古斯丁对此深恶痛绝，他所主张的“末世论”不仅把对未来的期许建立在基督的拯救或上帝的恩惠之上，还让末日的救赎成为决定性的且永不沦丧的胜利，让上帝之城成为“永无终结的终结”^④，也因此比循环论更能抚慰人心。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末世论”的价值在于，它把时间之流从无限且无望的循环中解放出来，给予其明确的方向和崇高的宗教意义。

斯宾塞的时间观散布在众多作品中，比较典型且集中的表达出现在《仙后》的《无常篇》中。诗中的无常女神是人间万物的主宰，形象极其可恶，“她彻底

① 详见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66页。

② 详见吴国盛《时间的观念》，第93-118页。

③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吴飞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141页。

④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下），吴飞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347页。

改变了万物的面貌，/完全失去了创世纪时的味道”，以至于“我们都被她诅咒，无人逃得过”。^①诗人让人类背弃上帝后堕入的尘世成为无常女神的领地，任其蹂躏，他虽然对无常女神的暴虐感到愤慨，却又赋予了她挑战众神的智慧和勇气。面对宙斯对时间本身的掌控，无常女神理直气壮地驳斥道“因为我们都看不见那些改变，/故而你们声称是自己在斡旋，/还说是你们在秘密操纵改变：/谁能让我们相信，既然看不见？”（《仙》三：635）

无常女神坚信眼见为实，要求宙斯“证明并验证”宇宙的规律性，因为在她看来，即便天体的运行也充满着无从掌握的变化（详见《仙》三：635），怀疑论者的姿态跃然纸上。在斯宾塞的时代，这样的怀疑方式发轫于哥白尼，针对的是被天主教会奉为正统世界观的古老的地心说。可见，无常女神对掌管众行星的诸神的挑战并非彻底的无稽之谈，因此诗人在《仙后》的结尾才会承认无常女神所说的话“很有道理”（《仙》三：641）。斯宾塞对无常女神的无奈接受暗含着他对推动万物变化的时间之毁灭性力量的认识。在基督教末世论思想的影响下，斯宾塞相信人类的原罪带来了腐朽和死亡，亦导致美德的丧失，时间因此对他而言具有了“邪恶性”（详见《“末”》：37）。

其实，无论是“末世论”还是原罪说，它们都会因为认识到时间之流所导致的万物腐朽这个必然结果而对现世怀有深深的不安全感甚至恐惧，这也是历史循环论者想要摆脱的感觉。斯宾塞对时间之流的恐惧在《无常篇》中显而易见，但他又以无常女神在天庭的败诉宣告永恒的存在，因为他在“末世论”对未来的许诺中看到了希望。但斯宾塞并不认同末世论者静待基督降临的消极态度，他更愿意接受新教伦理对时间意义的解释，即人类理应“利用时间进行劳作以便赢得上帝的荣光”（详见《“末”》：38）。时间在被末世论者赋予宗教朝圣意义之后，又被以浪费时间为耻的新教伦理增添了强烈的社会道德意味。更重要的是，新教伦理对劳动准则的秉持，实则是把救赎的责任部分给予了人类，把救赎的时间起点由飘忽不定的未来提前到可以把握的现在。这种伦理观使历史进程有别于自然过程，它把“人类意志的精神力量”视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之一，把广义的劳作即人类自身的道德努力视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和“责任感”的表现。^②这

^① 埃德蒙·斯宾塞《仙后》（第三册），邢怡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第585页。《仙后》共六卷，外加《无常篇》，中文版分为三册出版。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仙》”、册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译文据原文有所改动。

^② 详见布尔特曼《耶稣基督与神话学》，李哲汇译，收入布尔特曼等著《生存神学与末世论》，李哲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6页。

便显露出与古代及中世纪西方思想对超自然和时间之力量的依赖分道扬镳之势，因此已具备明确的现代特征。此外，以哥白尼日心说为标志的西方现代科学的兴起，也在很大程度上给予文艺复兴以来的人们对理性的信仰和对进步的信心，由此产生的“连续的、不可逆转的、无限的现代时间观”^①也在一定程度上潜入了斯宾塞于文学内外所做的伦理抉择中。

二、时间与田园的忐忑相处

作为一个客观规律，时间的流逝显然是不可抗拒的，所谓循环的或线性的时间观不过是人们对时间走势的不同判断。但人们对时间之流的心理排斥一直都存在，所以哲人们才会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超越时间的永恒力量，田园诗人们才醉心于描画悬置于梦想时空的静止时间。无论是古典田园诗歌里的黄金时代或再现黄金时代的阿卡迪亚，抑或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阿登森林，它们都是与世隔绝的和谐美好之地，更有着终年不变的温暖和丰盈，好似万物都获得了长生不老的秘诀，随着时间一起快乐地停滞。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开篇即按照由近及远的时间顺序，浏览了部分以英国乡村为背景的代表性文学作品，发现它们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值得追忆的“美好过去”；这许多的过去都进入了“一个向历史深处不断倒退的永久性过程”，直至回到人类的起点即伊甸园，而这些貌似虚幻的“美好过去”其实都有着可以还原的具体历史语境，都携带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价值观念。^②这种被称为“田园”的怀旧心态所反映的其实是一种拒绝与时间同行的倔强，也是祈祷时间停滞的妄想。

在对自然的再现以及艺术的本质等问题所展开的追问中，肯·希尔特纳观察到古希腊哲学家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变动不居的自然界的排斥，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永恒“理念”的追求。他还注意到马丁·海德格尔和汉娜·阿伦特的分歧，在后者看来，这种对于“永久性、稳定性和持久性”的追求，并非如海德格尔所言始自苏格拉底，而是人类本性所致，它使得人类从一开始就与自然处于矛盾的两端，并试图通过能够表现“理念”的人工造物，包括文学艺术，实现从无常到有常的转变。^③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改造自然的企图与文学艺术的创

① 安托瓦纳·贡巴尼翁《现代性的五个悖论》，许钧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4页。

② See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2.

③ See Ken Hiltner, *What Else Is Pastoral?: Renaissance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0-3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What*”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造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源于人类对于大自然无休无止的变化的深度恐惧，也即对时间之流的恐惧。田园诗歌无疑是这种恐惧感的典型但又隐晦的表达。

斯宾塞虽然也因时间之流所必然导致的腐朽而视时间为邪恶，但他并没有选择回避；相反，他把时间引入田园，让无情的时间随着四季更迭在自然景致中以及牧羊人柯林·克劳兹的生命中长驱直入。这一切首先发生在《牧人月历》中：借 E. K. 之名，斯宾塞在该书的总论部分详细解释了他为何选择采用罗马儒略历（Julius），以一月而非三月开始新一轮计年，其原因是“我们伟大的救世主和永远的拯救者耶稣基督化身为入，为这个腐朽的世界带来更新，让已然走到岁月尽头的时间罗盘重新回到起点，让他的子孙在新旧更迭之际纪念他的诞生”^①。斯宾塞把他对末世的期待纳入以弱的循环时间观为基础的计年方式中，赋予时间的无限循环以超越现实的意义，但他并没有放弃对时间之流的现实认知。全诗以寒风肆虐、万物枯寂的冬季拉开序幕，以果实未熟即落、几无收获的深秋结束。在该诗中，四季的变换没有带来田园诗应有的丰收景象，而是向着更深的冬季挺进，正如作为主角的牧羊人柯林无奈地意识到自己爱情未果、生命却已无可挽回地进入了暮年这一事实。林德海姆认为，诗人“通过将年月与人生由幼及老的过程联系在一起……让时间与他的主人公为敌”^②。林德海姆所说的时间是作为客观存在的物理时间，是自然界所有个体生命都无法摆脱的终结者。诗人，或作为其替身的牧羊人柯林虽无力抵挡它的攻击，但却借助它的力量让田园诗歌中一向被阻挡在时间之外的自然景致恢复其多样且多变的真实面貌。

斯宾塞对时间之流的现实感悟使得他对处于时间统治之下的野性自然充满畏惧。在《仙后》中，骑士们频繁出没的荒野危机四伏：他们的敌人隐藏其中，很多都是大地母亲的孩子，个个奇形怪状，面目可憎。^③ 斯宾塞塑造的自然力量虽然可怕且可恶，但真正对骑士们构成诱惑并成为更大威胁的却是安逸的田园生活和令人陶醉的田园美景：逍遥岛（Idle Lake）上美丽丰饶的田园景色不过是让人懈怠的温柔陷阱（详见《仙》三：446-448）；自然和人工合力打造的、被称

^① Edmund Spenser,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Edmund Spenser*, ed. R. E. Neil Dodge,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 1908, p. 8.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Complete”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Nancy Lindheim, *The Virgilian Pastoral Tradition: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Modern Era*, p. 138.

^③ 《仙后》中出现的大地母亲的孩子包括代表自然“惩罚”的“丑陋的巨人”奥格格里（Orgoglio）（详见《仙》一：159），在与亚瑟王的斗争中一次次从大地母亲那里“重获精气”的鬼魂一般可怕的马勒吉尔（Maleger）（详见《仙》一：618），以及企图阻止谷阳公前行、让大地母亲都“觉得耻辱”的一群“面目狰狞”的“巨硕海兽”（详见《仙》一：633）等。

为“最美人间天堂”的至福阁 (Bower of Blisse) 不过是“行乐的淫宫糜殿” (详见《仙》一: 650); 阿西德尔山谷里牧羊人的村庄是又一处“人迹罕至 [的] 人间天堂” (《仙》三: 514), 令骑士卡利道埃久久不愿离去, 险些忘记了自己的使命。这些地方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令人愉悦的避风港” (《仙》三: 516), 但在《仙后》中它们的出现“往往暗含危机和道德腐败” (《仙》三: 514)。从道德的角度来看, 安逸舒适的环境容易使人思想麻痹, 甚至成为骄奢淫逸的温床; 而从时间的角度来看, 典型的田园场景同样如此, 比如至福阁里的花园被比作伊甸园, 因为这里“叶子四季常青, 花儿永远绽放/从来没有暴风雨, 也没有霜降, /没有酷夏的灼热将它们烤黄, /也没有冰封的严冬酷寒难挡” (《仙》一: 647)。诗人用连续的否定词来渲染因时间停滞才有的一种理想化状态, 却更加暴露出田园世界的虚幻, 因为它建立在脱离现实的、静止的时间观之上, 企图用一个鲜花烂漫的瞬间来制造永远, 以此掩盖瞬间过后随时可能降临的危机或灾难。

对于妄想脱离时间的企图, 斯宾塞也同样保持着警惕, 这便是他在《牧人月历》中以时间的真实流逝来改造理想田园的现实动机。正是出于这种清醒的现实考虑, 斯宾塞在诗歌中一再发出善用时日、重塑历史的呼吁, 而他所提倡的一个塑造历史的重要方式便是农业生产。人类通过农业生产活动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同时也通过一定程度地干预自然来与时间抗衡, 试图让桀骜不驯的时间和大自然都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整个十六世纪, 英国不断遭遇大规模的粮食歉收, 并在 1590 年代经历了一场历时三年、影响波及整个欧洲的极度小冰期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饥荒。于是, 提高农业生产力、加大食物供给便成为应对饥荒及平息社会动荡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① 斯宾塞深知农业生产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意义, 因此才会在《牧人月历》这样一部高度寓言化的田园诗歌中利用农事比喻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 比如把自身行为不端、不能予人正确精神指引的天主教牧师比喻成“无所事事的”、“任由羊群随处游荡”的牧羊人 (see *Complete*: 40), 或是向放下牧笛、转而“耕耘土地/适时收获”的诗人维吉尔表达敬意, 暗示自己将沿着前辈开辟的文学道路勇往直前 (see *Complete*: 45)。

斯宾塞深受维吉尔影响, 同样以田园牧歌作为其诗歌生涯的开端, 以宏大的

^① See John F. Richards, *The Unending Fronti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 205–206.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 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Unending”和引文出处页码, 不再另注。

史诗向世人宣告其艺术的精进与成熟。虽然他并未如维吉尔那样创作过农事诗，但仍然像后者在《埃涅阿斯纪》里所做的那样，在史诗《仙后》中对一切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即洛所谓的“农事精神”给予道德上的肯定（see *Georgic*: 43）。斯宾塞的这一态度使其迥异于其同时代的其他诗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存在“一种对劳动的深刻鄙视，尤其是对手工劳动和农业劳动的鄙视”，这种态度在廷臣和贵族中普遍存在，并影响到了诗人们（see *Georgic*: 5）。当维吉尔的牧歌和史诗在十六世纪英国诗坛备受推崇之时，同样由其创立的农事诗却波澜不兴“在那个时期里，几乎所有有关乡村的诗歌都是牧歌式的”，例证之一便是出版于1600年的田园诗集《英诗渊藪》（*Englands Helicon*），该诗集“几乎被贵族式牧歌所垄断”，作者为清一色的廷臣和他们的崇拜者，所表达的无非是作为贵族式乡村生活理想的闲情逸致（see *Georgic*: 29 - 33）。

洛把斯宾塞明确视为扭转后辈诗人对乡村劳动态度的“一场重要革命”^①（*Georgic*: 33）的引领人，将斯宾塞在《仙后》中表现出的“对于维吉尔史诗农事维度的异乎寻常的接受”归因于诗人对《圣经·创世纪》的重新解读（see *Georgic*: 39），并指出斯宾塞其实是接受了新教思想对《创世纪》的阐释，即，不再把亚当在人间的劳作理解成上帝的诅咒，而是当作“抵御堕落之恶果的一次邀请或一个机会”（see *Georgic*: 42）。事实上，劳动的道德意义早已得到了圣奥古斯丁的肯定，他在论及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即“义人”时说，“义人在此生也要付出自己独特的辛劳，他们用这辛劳与罪过斗争”；但他同时又说，“辛劳虽然有用，却是对我们的惩罚”。^②新教否定了辛劳作为惩罚或诅咒的消极意义，让劳作成为人们主动选择的对象。从基督教的线性历史观来看，虽然亚当之罪已成为追悔莫及的过去，正如基督之死既无可挽回也不可重演，但人类却也因此获得了比静待基督更加积极的改变历史的机会。洛认为，斯宾塞比其同辈人更早地接受了以“勤勉、努力和劳动”为荣的新教工作伦理，也即“中产阶级价值观”，从而在根本上形成了对注重“闲适、优雅、潇洒”的“贵族理想”的改造（see *Georgic*: 42 - 43）。

斯宾塞在《仙后》中对贵族们习以为常的安逸生活所发出的道德警示，暗示了他改造这种“贵族理想”的企图，但他更多的还是试图通过对劳动的重视，尤其是对农事劳动的强调或赞许来重塑贵族价值观。因此，诗人让有着古老撒克

^① 洛将主要发生在十七世纪英国诗歌界、由诗人、科学家和宗教改革者共同引导的通往十八世纪农事诗大繁荣的艰辛历程称为“农事诗革命”（see *Georgic*: 5）。

^② 详见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下），第324 - 326页。

逊王室血统的红十字骑士被一位农人抚养长大，并让他在成为仙士骑士前先做一个名叫乔治的普通庄稼汉（详见《仙》一：265）。他还让代表谦恭美德与儒雅风范的卡利道埃骑士心甘情愿地“改掉上流的外貌”和做派，每天陪伴心爱的姑娘，“勤勤恳恳，将姑娘的羊群照看”，还帮她挤奶和驱赶豺狼（详见《仙》三：506-507）。骑士们从事着为其阶级所不屑的卑微劳动，但他们的辛劳付出非但没有让他们失去荣耀，反而为他们增添了无量的美德。与这些辛勤劳作的高贵骑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不从事农耕或放牧”的嗜食人肉的“野蛮的强盗民族”（详见《仙》三：480），还有“从来都不用镰刀或耕犁”的“目无法纪的布里甘族”（详见《仙》三：531）。

斯宾塞的诗歌涉及了放牧和耕种这两种农事形式；虽然他并没有否认牧人同样需要付出辛劳，但在《仙后》中，他却将农业劳动所具有的道德力量更多地赋予了农耕，把拒绝以耕种为生视为一项罪行，认为只有恶人或魔鬼才会令田野荒芜^①。因此，那个有着高贵出身和可贵品质的野蛮人，才会因为他“农耕的活从来不干”而难以摆脱与野兽为伍的命运（详见《仙》三：381）^②，毕竟农耕是文明的首要手段和主要技能。当安然享受自然馈赠的野蛮人不再是被羡慕的对象时，被田园诗人们奉为至高理想的黄金时代便已时过境迁，田园诗歌所推崇的贵族价值观也势必要被新的价值观所取代，悠游于田园世界的时间也会被催促着快速前行。斯宾塞的改革意图在《仙后》第六卷第九章的开头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也是《仙后》中最长的一段有关农耕活动的描述：

快乐的马儿们，现在将头调转，
咱们再回到离开的那片农田；
我还有一两个垄沟活儿未干，
我的犁头儿还没有将地耕完：
似乎是土壤肥沃的良田一片，
当我经过之时都觉得丢脸，
如此肥田竟遭我们疏于照管；
卡利道埃的不朽美名永流传，

^① 《仙后》中还提到一个“荒芜了所有远近之地”的恶人（详见《仙》一：20），以及“荒芜了他们的田野”的“地狱恶魔”（详见《仙》一：7）。

^② 不过，《仙后》第六卷并没有清楚交代野蛮人的真正出身和最后归宿。

但如今却要被侮辱丑化一番。(《仙》三: 489)

在这段引文中,即将收耕的农人代表着将继续叙述卡利道埃骑士历险故事的诗人;引文中铺张的农事比喻与道德感十足的语言表述,如“丢脸”和“侮辱丑化”,揭示的正是诗人“针对彼时人们对农业劳动怀有的典型[鄙视]态度而进行的大力纠正”(Georgic: 37)。

斯宾塞的改革决心来自他的末世意识即他的历史使命感。《仙后》第五卷的序言采用了田园诗歌惯用的新旧对比手法,呈现了一个黑白颠倒、偏离正途、“尽失昔日尊容”(《仙》三: 5)的石器时代。刘立辉认为,斯宾塞持有末世论者典型的历史循环观,诗人借石器时代暗指彼时已深陷混乱的人类社会,期待伊丽莎白一世能如“黄金时代的正义女神”一样,“开辟一个以和谐为主体的新纪元”(详见《宇》: 125)。在塞申斯看来,斯宾塞受到了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及《农事诗》中的历史观的影响,认定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如同维吉尔所在的共和国与帝国交替中的罗马一样,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需要人们抓住时机扭转混乱的时局,因此他和维吉尔一样,把“劳动,或赫拉克勒斯式的努力”视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关键”(see “Spenser’s”: 205)。换言之,与战争相比,两位诗人都更重视时间对人们坚持不懈与顽强不息的要求,更愿意赞颂时间在作用于平凡乃至卑微的劳动后所形成的改变社会的力量。正如红十字骑士在高山之巅得到一位名叫“冥想”的修道士指点后,才明白自己早年的务农经历和所有磨难都不是偶然,而他所目睹的“永恒的宁静与安详”的美丽城邦新耶路撒冷则注定是他未来努力的方向(详见《仙》一: 260)。塞申斯指出,斯宾塞与维吉尔的不同在于,斯宾塞更强调“历史的集体属性”,因此借用了维吉尔《农事诗》的“复数结构”,在《仙后》中塑造了亚瑟王这样一位汇聚了众多英雄之不懈努力与坚韧品格的“新型集合式英雄”,以此表达他“对历史时间的新启示”(see “Spenser’s”: 203-206)。

三、时间与殖民政治的无奈纠葛

斯宾塞的末世意识促使他以一种积极的姿态看待时间给予的历史机遇,如同维吉尔那样期待“一个新时代的荣光”(“Spenser’s”: 205)。苏姗·沃福德认为,《仙后》中亚瑟王与仙后格罗丽亚娜的婚约象征着不列颠将通过重拾“昔日的荣

耀”，迈向“一个更加辉煌的光荣时刻”。^①可见，斯宾塞对社会进步的企盼使得他的时间意识在历史循环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线性的、向上的现代时间观，这表明他在接受时间挑战的同时，也把时间视为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因素。事实上，斯宾塞甚至把他对社会时间的信心投射到了自然时间之上。在《无常篇》中，造物主自然女神指出，自然万物虽充满变化，但其实“都各行其道，分毫不乱”，并“最终又回到自己的本原”，所以时间并没有把自然引向毁灭，反而臻于“极致圆满”（详见《仙》三：639）。自然女神所揭示的无非是无常与有常的辩证关系，正如该篇中十二宫的轮番登场令人眼花缭乱，但其内在的规律却无法撼动一样。

不过，诗人对自然规律的强调却难掩这样一个事实，即时间一旦被人为加速，便有可能给自然带去违背其自身规律的、无法逆转的改变。洛在十二宫上演的神话游行中注意到，“季节性劳动成为在自然中生活的人类需要永久关注的首要任务”，并据此认为这是诗人在《仙后》中对“农事价值”所做的最终肯定（see *Georgic*: 67-68）。洛似乎没能认识到，诗人对农事的神话处理本质上是想将农业塑造为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以此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农业从来就是人类文明作用于自然的结果。当人类社会的发展渐渐脱离自然的节奏，当自然时间被政治和经济所胁迫，农业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甚至灾难性的，这正是我们在斯宾塞的文本内外看到的发生在十六世纪后期英国和爱尔兰的情形。斯宾塞虽然对自然的残酷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却常常选择性地忽视人类文明作用于自然时所具有的潜在的毁灭性力量，并在文明的偏见下，视自然为野蛮，将对自然的“改造”视为人类的福祉。

作为一个十六世纪晚期的大地主，斯宾塞对农事的关注程度以及对其社会价值的肯定程度的确如洛所观察到的那样，远远超过其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受教育阶层。或许，斯宾塞正是利用了农事所强调的顺应时节、把握时机的重要性，在敬献给女王的史诗中或明或暗地劝谏她抓住时代先机，建立“一个公正和富有成果的帝国统一体”（*Georgic*: 39）。洛所说的“帝国统一体”很好地总结了斯宾塞作为一个诗人所怀有的政治理想，即他希望女王及其廷臣能接受他借《仙后》传递的农事价值，以持续踏实的工作来实现帝国崛起这一伟大目标。洛指出，“农事视野”与“帝国想象”之间的潜在关联本就存在，维吉尔的《农事诗》即为例证，斯宾塞对殖民活动的直接参与和大力鼓吹，更加证实了两者间的联系

^① See Susanne L. Wofford, “The Faerie Queene, Books I-III”, in Andrew Hadfield,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pens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08.

(see *Georgic*: 68)。不过，洛强调的是斯宾塞的“农事视野”如何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尤其是其对即将蓬勃开展的十七世纪英国农业改革以及英国诗歌界的“农事诗革命”起到的重要激励作用，他忽略了“农事视野”在英帝国殖民计划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也没有把农业生产的环境影响纳入讨论范围。事实上，无论是斯宾塞积极的时间观念还是其倡导的貌似普世的农事价值，都与他视为理想的殖民事业密切相关，是英帝国殖民政治的宣传手段。

英国对爱尔兰的正式统治始于 1541 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自封为爱尔兰国王，此后从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英国开始了在海外的大规模殖民扩张。斯宾塞对英国殖民政策的维护，代表着十六世纪英国统治阶层和地主阶级的普遍态度。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1516) 中提出，对外族发动战争的理由只有一个：“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善用它的土地，任其荒芜，却又禁止他人依照自然法则去占用该土地并受其滋养，那么他人就有发动战争的最为正当的理由。”^① 莫尔利用善用土地这一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给侵略战争披上了正义的伪装，为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肆推进预备了最有力的道德辩护，更为英政府及其在爱尔兰的殖民政府提供了战略性引导。斯宾塞于 1580 年随新任爱尔兰总督格雷爵士 (Arthur Lord Grey of Wilton) 的军队进驻都柏林，此后除了数次短暂的返乡之旅便没有离开过爱尔兰，直至 1598 年底从骚乱中的爱尔兰回国，并于次年初在威斯敏斯特离世；这一时期也正是英国在爱尔兰殖民活动的高潮期。伊丽莎白一世政府采取的一项主要殖民政策便是把从爱尔兰“叛乱者”手里没收的土地封赐给殖民军队将士，以此实施对爱尔兰人及其土地的征服。自担任格雷爵士的私人秘书以后，斯宾塞多次升迁并屡次获封收缴的土地及房屋，到 1588 年升任芒斯特市议会书记官一职之时，他已是拥有一座城堡和三千多英亩地产的大地主 (see *Complete*: xi - xxiii) 。

与莫尔一样，斯宾塞需要为英国殖民者在爱尔兰进行强取豪夺寻找借口。在《爱尔兰现状之我见》(1596) 一文中，他通过丑化和妖魔化爱尔兰人来维护格雷爵士所采取的一系列极端暴行。在他看来，战争和饥荒是对付爱尔兰“暴民”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是获取土地的最佳办法。他在绘声绘色地描述芒斯特饥民的惨状后宣称 “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之地突然间人畜寥寥。当然，在那场战争中并没有那么多的人毙命于刀剑之下，他们全部死于极度的饥饿；那是他们自

^① Sir Thomas More, *Selected Works of St. Thomas More: Utopia*, ed. Edward Surtz,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76.

找的。”^① 斯宾塞显然把芒斯特饥荒的成因归咎于爱尔兰人，认为正是他们自己发动武装暴动，才迫使格雷爵士以毁田的方式人为制造饥荒，以此消灭那些“顽固不化的叛乱者”（*View*: 157）。这段话不但证实斯宾塞“对爱尔兰人怀有普遍的歧视”（*Complete*: xxi），还暴露出他对爱尔兰这个“物产丰富之地”的觊觎之心。希尔特纳指出，所谓“被殖民者”不单指人，还应包括土地和物产；有时后者对殖民者的吸引力甚至大过前者，以至于在一些多发生于早期殖民统治期间的事件中，殖民者为了侵占土地、掠夺自然资源而大肆屠杀当地原住民（*see What*: 162）。芒斯特饥荒无疑是这些事件中的一个典型。

芒斯特饥荒其实也表明，英国殖民政府在爱尔兰的地位岌岌可危。在斯宾塞看来，那是文明初创时期必然会遭受的来自野蛮力量的威胁，正如《仙后》中身处蛮荒之地的骑士必须时刻准备着面对野蛮人的攻击。斯宾塞把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视为文明对野蛮的改造，为此他对爱尔兰人及其土地也进行了一番文学改造。希尔特纳的研究表明，从中世纪开始，爱尔兰在英国文学中的形象就颇为分裂：一方面是富饶美丽的土地，另一方面是好战恶劳的爱尔兰人（*see What*: 166）。

斯宾塞对爱尔兰的描述基本延续了这一传统，但形式和手法更加丰富多样。《仙后》第六卷用神话的形式来展现爱尔兰前世今生的巨大落差。故事中，曾经最喜欢流连于爱尔兰山林之间的月神暨自然神戴安娜，因为被畜牧农林神福纳斯冒犯而对其施加惩罚，致使爱尔兰这个美丽富饶之地变得寂寥荒芜、豺狼横行。诗人运用奥维德式变形神话手法，赋予爱尔兰当地的河流以生命，把由大江小河组成的家族亲情网络纳入众神的爱恨情仇之中，让神话与方志衔接得天衣无缝。而诗人的更“高明”之处是对爱尔兰的“堕落”所做的自然化处理。诗中对女神的惩罚所带来的恶果有如下描述：

不仅仅是小溪被戴安娜抛弃，
还有阿洛山周围迷人的林地，
以及那些大山，它们高高耸立，
远眺最富饶的原野变得贫瘠，

^① See Edmund Spenser, *A View of the State of Ireland as It Was in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Written by Way of Dialogue between Eudoxus and Ireneus*, Dublin: L. Flin and Ann Watts, 1763, p. 159.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View*”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养育大马哈鱼的舒尔多美丽。
所有那些，及她曾看中的东西，
均被抛弃，她离开那个伤心地，
并且留下灾难诅咒，十分苛厉，
即让豺狼们在她的灵地栖息，
森林损毁，而且沿海盗劫频起，
这些诅咒的结果持续至今，
从前的林地和美丽的狩猎区，
如今藏有恶狼和强盗，成百上亿。（《仙》三：609-610）

斯宾塞在这里表现了爱尔兰因失去自然神的眷顾而产生的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变化。在对美好过去的描述中，他用“富有与正直”来形容爱尔兰曾经享有的声誉，甚至称之为“圣群岛”（holy - Islands）（详见《仙》三：601），对其达到的文明高度表示肯定，也因此对爱尔兰如今的文明“退化”深感痛惜。斯宾塞借用田园诗最常用的新旧对比手法，目的只是为了否定现在。他对文明与野蛮的判断带有强权文化的特征，更暗含着文明对自然的偏见，因此才会把早已将狼赶尽杀绝的英格兰作为文明旗帜，把容许豺狼藏身的爱尔兰斥为野蛮之地。^①

此外，他把所谓的“堕落”的罪责归于不司其职、只顾偷窥女神的畜牧农林神，也无疑有着强烈的暗示：农事不兴在引来农牧业的大敌即豺狼的同时，也导致社会秩序崩塌；而所有这一切罪恶的发生全然没有外来力量的参与，只与爱尔兰和他们那个愚蠢的农神有关，这重复了《爱尔兰现状之我见》中对爱尔兰人的指责。现实殖民活动给爱尔兰造成的社会和环境破坏，比如饥荒、暴乱和森林的损毁就这样在神话的巧妙建构中被抹杀得一干二净。

理查德·麦凯布指出，《仙后》不仅是一部“民族史诗”，更是一部“殖民罗曼司”，因为对于斯宾塞而言，“打造一个‘野蛮人’”的紧迫性不亚于“打造一位‘绅士’”，毕竟野蛮人的存在是殖民统治的最佳借口。^② 斯宾塞对爱尔兰和

^① 《牧人月历》“九月篇”中的牧羊人霍宾诺斯认为，自撒克逊王统治时期，英格兰境内的狼便已绝迹。E. K. 所做注释肯定了这一点，并把这一时期确定为爱德华王统治时期（957—975）（see *Complete*: 43）。

^② See Richard A. McCabe, “Ireland: Policy, Poetics and Parody”, in Andrew Hadfield,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penser*, p. 61.

爱尔兰人大肆贬斥，所依据的正是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大行其道的“扩张伦理”，他的文学创作和政治经济活动都以“是否满足和维护英国殖民利益为前提”，他本人也因此被视为以文学手段“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国家伦理道德的制定与修正过程”的典型代表。^①

在晚期田园诗《柯林·克劳茨回乡记》(*Colin Clouts Come Home Againe*, 1595) 中，斯宾塞依旧遵循扩张伦理，改用共时的对比手法，把爱尔兰的自然与社会相并置，突出自然的美好和社会的丑恶。牧羊人柯林为爱尔兰的河流编织了一个浪漫神话，借此唱颂爱尔兰的美丽山川，之后便引入了英格兰这个更加辽阔的遥远国度。诗人借柯林之口把英格兰塑造成人间天堂“那里幸福的和平与丰沛的储藏/携手带来极致的满足。”(*Complete*: 691) 与爱尔兰相比，英格兰的山水和物产毫不逊色，却丝毫没有饥荒战乱之忧，也完全不受凶残的饿狼和藏匿于森林的流寇的侵扰。这首诗歌在短短八行里用了十数个否定词，以英格兰的富足安定来反衬爱尔兰的混乱无序(see *Complete*: 691)。尽管英格兰的实际状况远没有诗中描写的那么美好，斯宾塞对英格兰现状也多有不满，但为了描黑爱尔兰，他不惜对英格兰进行理想田园化的再造，让英格兰的文明昌盛与爱尔兰的落后野蛮在停滞的田园时间中一同得到固化。

至于斯宾塞为什么会为爱尔兰的自然与社会做如此显著的差别化呈现，希尔特纳似乎在《爱尔兰现状之我见》中找到了答案。斯宾塞把爱尔兰描绘成“一个天底下最美丽和温柔的地方”，土地肥沃，森林密布，山川纵横，良港众多，“向英格兰 [和] 苏格兰敞开怀抱，邀请我们造访”(see *View*: 29)。诗人在此把爱尔兰的土地进行女性化处理，强调其温婉且多产的特质，反映出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普遍期待，也表明他对英格兰文明的魅力充满信心。希尔特纳发现，把殖民地想象成“盼望拥有一个丈夫的处女”这一风尚始于十六世纪甚或更早，“丈夫/农夫”(husbandman) 一词的双重含义，使得它既可以被用来宣告殖民者对殖民地的合法占有，又符合十六世纪开始萌发的农事热情(see *What*: 167)。同时，它还尤其符合英政府在爱尔兰推行的以英格兰农业为模板、以谷物种植为主的新的土地使用方式。^② 以斯宾塞对农事的重视来回观芒斯特饥荒，他更有可能如

① 详见徐彬《导论》，收入徐彬主编《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6页。

② See R. Gillespie, "Explorers, Exploiters and Entrepreneurs: Early Modern Ireland and Its Context, 1500-1700", in B. J. Graham and L. J. Proudfoot, ed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Ireland*,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93, p. 129.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Explorers”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希尔特纳所说的那样，“相信正是由于爱尔兰人和老一派的英国人^①没有采用农事伦理，没有很好地尽到农夫的职责，才导致饥荒的发生”（*What*: 171）。

斯宾塞把拒绝改变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爱尔兰人视为殖民道路上的障碍。按照斯宾塞的思路，既然爱尔兰人不事农耕，以至于浪费了土地的生产潜力，他们就应该被更加勤劳也更加善于管理土地的英格兰农民所取代。因此，在格雷的军队以战争和饥荒的双重屠刀把不愿屈服的爱尔兰人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消灭殆尽之后，斯宾塞提出了他的土地改革计划。《爱尔兰现状之我见》中的艾雷尼厄斯作为斯宾塞的代言人，主张把土地当作巩固英殖民政府统治并彻底征服爱尔兰民众的政治工具。在他的计划中，所有随军定居爱尔兰的英国人都可获赠土地，而那些为数不多的愿意放下武器、表示臣服的爱尔兰人则可以从这些英国人手中租地耕种，但前提是“从此以劳动作为谋生手段，并致力于文明的诚实交易活动”（*see View*: 187）。斯宾塞对爱尔兰人的文化歧视在他对爱尔兰的这种“文明”期许中暴露无遗。

其实，英国对爱尔兰的强权政治以及两者间的文化冲突都与宗教矛盾密不可分，斯宾塞对爱尔兰人的歧视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歧视。《仙后》把天主教徒归入邪恶的一派：妖女杜艾莎以罗马教皇为父，与象征英国国教的尤娜及其父亲形成了对立。研究者通过《仙后》错综复杂的叙事，看到了发生在宗教、个人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善恶大战，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代表基督的英国国教与伪基督的罗马天主教之间的战斗”（《宇》: 126）。《仙后》第一卷中红十字骑士的遭遇即象征着创世时的善恶力量重聚于现世后所展开的基督与伪基督之间的末世较量，因为斯宾塞相信，相较于作为弃民的爱尔兰人，作为上帝选民的英国人至少拥有以道德努力争取自救的机会（详见《宇》: 124）。就此而言，在《牧人月历》的“五月篇”中，当斯宾塞将牧羊人皮尔斯与佩林罗蒂所代表的新教与天主教之争呈现为农事伦理与田园旨趣之争时，他不仅宣扬了新教对人的精神指引，还强调了新教工作伦理所具有的道德优势。

斯宾塞把以农耕为主的农业形式以及规范的市场经济作为文明的标准，把不符合上述标准的爱尔兰斥为野蛮，反映出已然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英格兰与仍旧停留在封建社会的爱尔兰之间的文化和政治冲突。斯宾塞所代表的早期现代英格

^① “老一派的英国人”（the Old English）是斯宾塞对早期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者的称谓。他多次在《爱尔兰现状之我见》中表达对他们不满，认为他们已经“堕落到与爱尔兰人无异的地步”，且他们对待英国人的态度甚至比爱尔兰人“更恶劣”（*see View*: 74）。

兰移民和都柏林及其附近区域的英裔爱尔兰人，“依靠市场以及供需关系所决定的价格，进行剩余物质的再分配”，把从英王那里获得的土地以租赁方式交给租户管理，双方关系靠合约来维系（see “Explorers”：136）。与之相反，由盖尔人构成的爱尔兰土著“基本没有市场的概念”，地主与下辖的自由农之间没有金钱交易，只有前者的军事保护与后者提供的食物和服务之间的交换（see “Explorers”：132 - 133）；其关系实质如同希腊史诗中的领主与勇士，或斯宾塞《仙后》中的君主与骑士。尽管斯宾塞也曾在《爱尔兰现状之我见》中少有地对爱尔兰人表示赞许，称他们“非常勇敢，坚韧”，又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能忍受饥寒、劳苦和一切艰辛”（see *View*: 111），但在《仙后》中他却只把这些优秀品质赋予了书中的英格兰骑士，而以打家劫舍、不事耕作的蛮族来影射爱尔兰人^①。

在回顾都铎王朝（1485—1603）时期英政府对威尔士及爱尔兰山地牧区所进行的农耕化改造时，约翰·理查兹指出了其中隐藏着的英格兰人的文化傲慢，因为在英格兰人看来，似乎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让那些居住在荒野要塞中的未经开化的野蛮人身上的‘文化堕落’得到纠正”（see *Unending*: 198）。斯宾塞对爱尔兰人的态度显然与此如出一辙。习惯以牧业为生的爱尔兰人因不事农耕而受到道德谴责，成为诗人笔下“不务农事的‘他者’”（*What*: 15），这既反映出由牧业到农业的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也暗示了时间观念的改变和冲突。斯宾塞以勤劳为美德，要求人们不负光阴，但又把勤劳这个传统美德与牧业强行分离，而与农耕强行结合在一起，这绝不只是对田园诗歌和农事诗歌惯性思维的遵循，其背后的现实根源实际是早期资本主义对土地价值的加大索取及对时间的超常压缩。被压缩后的时间势必获得越来越大的加速度，把悠游循环的时间轨道远远抛在身后，急速奔向那个徐徐开启的新时代。

按照资本的现实主义原则，选择农业或牧业的关键在于它是否有利于土地的高效使用。事实上，英国国内为应对人口激增和食物短缺等问题，从十六世纪开始直至十八世纪上半叶，通过实行“区域专业分化、加大国家层面的市场融合、增加资本投入、加强土地利用以及扩大可耕地”等措施，使得农业和牧业都获得了加速发展（see *Unending*: 207）。这里的所谓“区域专业分化”即指“在英国

^① 希尔特纳认为，《仙后》中的“野蛮的强盗民族”和“目无法纪的布里甘族”指代的是爱尔兰人（see *What*: 165 - 168）。

北部和西部高地发展畜牧业，南部及东部的低地发展谷物种植和牲畜养殖的混合性经济”；而“加强土地使用”则是要达到“以土地和[农业]工人组成的每个单位的总产出和总收益在谷物种植区和牧区都稳步上升”的效果（see *Unending*: 207）。可见，资本所关注的不是农业或牧业本身，而是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任何生产形式都有可能被采用。伊丽莎白一世政府之所以在爱尔兰的原有牧区推行农耕，主要是为了保障英军的粮食供给，同时也是为了利用土地尤其是可耕地这样的固定资产来吸引更多的英国人加入殖民者队伍中，从而加强对爱尔兰人的控制。

斯宾塞贬低放牧、抬高农耕，不过是为了给英殖民政府的土地政策摇旗呐喊，以加强对殖民地土地资源的压榨。而其农事伦理无论是作为维吉尔古典思想的传承，还是作为新教信仰的延伸，无疑都给这个现实目的披上了一件再体面不过的华丽外衣。马克斯·韦伯认为，“源自新教的理性主义和工作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兴起至关重要”^①。他的这一观点让我们认识到，尽管斯宾塞对农事的积极姿态在与阴暗的殖民政治瓜葛相连的同时，与英国的贵族式理想格格不入，但却表现出了重要的历史趋势，也为我们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历史时空中理解斯宾塞及其思想提供了可能。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在政治、宗教、文化和经济等各个层面都呈现出一个转型期社会所具有的冲突与机遇、动荡与发展并存的特点。由于人口和经济的全面回升，农业的高效发展迫在眉睫，这势必给土地资源造成更大压力。维·乔·霍斯金斯对比了十六世纪初和十七世纪末的英格兰景观，其结果发人深省。十六世纪初，英格兰的人口只有250到300万，而羊的数量是人的两到三倍。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度，英格兰不光拥有农田，更有大片茂密的森林，还有荒野、高原和牧场围地穿插在森林中间。一位意大利人在1500年前后抵达英格兰时，不禁感叹那里的人们“似乎一点都没有从其肥沃与富足中获益”^②；他所说的“富足”不仅指看得见的森林和土地等资源，还指大量未经开采的地下矿产资源，而他的这番话也预示了斯宾塞对爱尔兰人的抱怨。果然，在接下来的近两个世纪里，林地被大规模破坏，既用于农业开发，也为不断发展的城市提供生活所需的燃料。有研究表明，“到1600年英国南部的森林已大部分被砍伐”

^① 转引自马立博《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W. G.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梅雪芹、刘梦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37页。

(《现》: 114); 至十七世纪中期, 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森林也已“被圈占, 成为英格兰浩瀚壮观的麦田”^①。由于英格兰的土地和森林资源已至稀缺, 人们甚至把沼泽地之类传统意义上的荒地也改造成可耕地 (see *What*: 160)。可见农业经济的发展终究要面临土地匮乏的困境。

马立博认为英国之所以能最终摆脱这一困境, 部分是得益于“新大陆的资源 and 便利的煤炭开发” (《现》: 126)。他从全球视野来观察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为其带来的重要经济转机, 而实际上英国在此之前对爱尔兰实施的殖民扩张也同样出于对后者自然资源的急迫需求。爱尔兰不仅有令英国人垂涎的大量无人耕种的土地, 还有丰富的矿产和渔业资源, 以及棉纱和羊毛之类的纺织原料, 而在英国森林资源几近枯竭的情况下, 爱尔兰在贸易中向英国输入的木材从 1550 年起急剧增多, 为英国国内的经济发展解了燃眉之急 (see “Explorers”: 132)。事实上, 正是由于英国于十六世纪开始在欧洲国家中率先进行农业改革, “从旧生物体制^②经济中强行索取更高的生产率” (《现》: 126), 并于十七世纪中期之后初显成效, 才有可能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依然生产出“令人欣慰的剩余物质”, 成为“早期现代欧洲帝国中的一个特例” (*Unending*: 207)^③。加之英国在爱尔兰、北美等殖民地的经济活动为其提供了持续动力, 英国在经历了十七世纪全球性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之后, 在十八世纪与法国一起“脱颖而出, 成为欧洲国家中最强大、最有竞争力的两个国家” (《现》: 96), 并在此后的一百年间经由工业革命的推动, 最终成为欧洲最强国。

英帝国确实如斯宾塞所愿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的关键时期抓住了时代先机, 走在欧洲向现代社会集体迈进的队列的前端。斯宾塞对农事的重视以及对殖民政治的执念使他成为一个具有远见之人, 但其远见仅限于为英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崛起所做的考虑; 实际上, 无论是在英帝国的强盛还是斯宾塞的农事伦理的背后, 都有巨大的被选择性忽略的社会和环境代价。英国以圈地为主要形式开展的农业改革, 不仅让很多自由农失去土地, 让依赖公有地为生的乡村贫民的生活更加艰难, 也极大消耗了森林资源, 破坏了农业用地与荒野、沼泽及森林之间的生态平衡。而英国殖民者不光强迫爱尔兰人以农代牧, 还把他们原有的一些适合山区多

① W. G.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 第 138 - 139 页。

② 马立博把“旧生物体制” (the biological old regime) 解释成前现代时期全球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和自然环境”, 即“一个绝对的农业世界” (详见《现》: 21); 人们的活动受到“自然环境中有限的活性氮的供给”的极大限制 (详见《现》: 34)。换言之, “旧生物体制不仅限制着人口数量, 而且也限制着生产能力” (《现》: 98)。

③ 理查兹称,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从 1550 年的 300 万增长到 1650 年代的 550 万 (see *Unending*: 205)。

岩石地势的耕地技术斥为落后和野蛮，强行推广所谓的文明方式^①，使得殖民者与当地农牧民冲突不断，其中不乏“芒斯特饥荒”这类灾难性的武装冲突，更让爱尔兰步英国之后尘，走上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严重退化的道路。弗朗西斯·勒德洛与阿琳·克兰普西指出，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九年战争（1594—1603）在决定性地巩固了英帝国对爱尔兰的政治主权的同时，也带来了爱尔兰经济的现代化以及“爱尔兰风景的英国化”。^②但无论是英格兰森林的消失还是爱尔兰风景的改变，都不是诗人斯宾塞的关注重点。《仙后》第五卷序诗中描述的乱世犹如“宇宙生成之初的混沌状态”（《宇》：125），虽不乏自然力量的参与，但却主要暗示了英国当时的社会状态。斯宾塞显然并没有把社会混乱与农业改革所造成的社会压力或生态失衡造成的极端气候等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只一味呼吁以农事来促进社会改良，提升经济，增强国力。斯宾塞的政治和社会身份可以让他无视农业改革的弊端，尤其是从英国移植到爱尔兰的农业改革所制造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以及种种社会不公；他在殖民地的经济利益与时代施于他的局限性相叠加，也使得他不可能认真思考农事活动可能带来的严重的环境压力。

事实上，正如希尔特纳所说，农耕与放牧相比是“对土地采取的一种更加积极、亦更具侵略性的姿态”（*What*: 162），更何况英国在其本土和爱尔兰所进行的农业改革是对土地的最大限度的掠夺性开发。或许我们不应该苛求斯宾塞重视农业加速发展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毕竟他所表现出的漠视是一个时代现象。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人可以大肆抱怨燃煤所导致的空气污染，就像斯宾塞在《仙后》中描绘财神的老巢“蒙着一层黑炭般的肮脏云雾”（《仙》一：480）^③，但他们并不会把煤炭用量的激增与英国在十六世纪晚期遭受的严重木材荒进行深层次的联系，不会意识到造成木材短缺的原因除了极度小冰期的影响，

① 威利·梅利以爱尔兰人惯用的把犁拴在马尾巴上耕地的做法为例，说明英国农业改良派与坚持传统的爱尔兰农民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固有偏见（see Willy Maley, “‘Barbarisme and obdurate wilfulness’: Agricultural Materialism, Animal Welfare, and Irish Studies”, in Sarah Covington et al., eds., *Early Modern Ireland: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19, pp. 234–239）。

② See Francis Ludlow and Arlene Crampsie, “Climate, Debt, and Conflict: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a New Direction in Understanding Early Modern Ireland”, in Sarah Covington et al., eds., *Early Modern Ireland,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p. 277.

③ 托德·博立克根据斯宾塞在《仙后》中对空气污染的描写以及对矿业的道德指责，认为斯宾塞具有一定的环保意识，并认为他主张有节制地发展经济，“适度并合理地管理国家的自然资源”（see Todd A. Borlik, *Ecocriticism and Early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Green Pastur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164）。但是，斯宾塞对农业改革的积极态度或其对帝国崛起的狂热并不能支持博立克的这个观点，而诗人在对待爱尔兰自然资源上的“非节制”态度更应该遭到严肃的道德谴责。

还有农业改革政策下的可耕地开发对森林的破坏，以及造船业在殖民扩张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双重推动下对木材的极大消耗，更不可能出于环境的考虑而希望放缓发展的步伐。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斯宾塞所倡导的农事及农业改革违反了自然规律所要求的正常时间节奏，实际上是在向未来提前支取时间。它虽然带来了英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崛起，貌似实现了时间对末世论者的承诺，却终将在更加遥远的未来让英国乃至世界为它们强加于时间的加速度付出代价。

结 语

安德鲁·哈德菲尔德认为，斯宾塞的作品经常导致截然不同的解读。“如果说十七世纪早期直至二十世纪中期的批评家和作家曾认为斯宾塞的诗歌散发着感性之美，充斥着华丽的慵懒和引人堕落的奢靡，那么另一些人则将他视为拥有主张军事强权、宣扬对外扩张的英国清教思想的帝国诗人”；W. B. 叶芝也因为诗人自身“无法避免的深刻矛盾”而对其诗歌爱恨交加。^①在叶芝看来，斯宾塞诗歌中有关爱尔兰的部分最缺乏诗意和道德，问题就在于斯宾塞“不仅把国家视作美德的犒赏者，还将之视为善恶的确立者，并在其指引下付出自己的爱憎”。^②叶芝无疑抓住了斯宾塞思想的根本问题，即把文学与政治过多地捆绑在一起。如果我们了解斯宾塞的文学理想，他的这一做法便不足为奇。正如洛指出的那样，斯宾塞在其创作生涯之初便拥有“一个主张变革的诗人的本能”，希望以其诗歌来改变社会（see *Georgic*: 66）。无论是在早期的《牧人月历》还是晚期的《柯林·克劳茨回乡记》中，他都以田园诗的简朴装束为掩护，介入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最终把他的观察和思考都归结到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即“诗人在国家的多重生活中[应该]占据[怎样]的位置”^③。

帕特里克·切尼将斯宾塞从早期到晚期的改变总结为从“英格兰头号田园诗人”成长为“不列颠的头号田园诗人”这样一个过程。他特别有感于斯宾塞在《仙后》中表现出的高超的时空腾挪技巧，以及在神话和历史的交错间所展现出的开阔眼界，并因为《柯林·克劳茨回乡记》具有相似特征而认为它已超出传

① See Andrew Hadfield, "Introduction: The Relevance of Edmund Spenser", in Andrew Hadfield,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penser*, p. 3.

② See W. B. Yeats, "Edmund Spenser", in W. B. Yeats, *Essays and Introduc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61, p. 371.

③ Patrick Cheney, "Spenser's Pastorals", in Andrew Hadfield,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penser*, p. 81.

统田园诗的境界，将其称为“进步田园”（pastoral of progression）或将其归为“伊丽莎白小史诗”（the Elizabethan minor epic）。^①切尼显然接受并赞赏斯宾塞作为一个帝国诗人的责任感，也可能相信斯宾塞在与爱尔兰相关的作品中传达的以线性时间观为基础的进步历史观，但他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诗人为了帝国大业而对历史所进行的篡改，比如《柯林·克劳茨回乡记》里罔顾事实，对英国进行全面美化，《仙后》第六卷第六章的爱尔兰神话中又编造了爱尔兰自古就属于英伦三岛的谎言（详见《仙》三：601）。

斯宾塞对于帝国振兴怀有极大的热忱，于其立场而言或无可厚非。他对于艰苦劳动所具有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价值亦有着坚定的信念，只可惜他作为一个殖民者的政治立场在其创作生涯开启不久便越来越多地干扰了他的价值观，使他无法在社会和历史观察中保持公正与客观，也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带给他的心灵震撼和诗意想象之中。借用斯宾塞自己常用的一个农事比喻，他是一个在诗歌王国里辛勤耕耘的农夫，却在这个过程中不幸地选择了一块有辱其付出的土地。这位英国诗歌的伟大开创者错误地让政治时间侵入其艺术空间，把世人心中共有的理想田园谱写成帝国颂歌，给英国诗歌史，也给后世崇尚自由平等的读者心里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作者简介] 陈红，女，1967年生，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诗歌和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态批评。近期发表的论文有《论马维尔笔下割草人形象中的农事理想》（载《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

责任编辑：龚蓉

^① See Patrick Cheney, "Spenser's Pastorals", pp. 81-101. "小史诗"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个新文类，切尼将之称为“伊丽莎白时期真正的先锋诗歌”（Patrick Cheney, "Spenser's Pastorals", p. 97）。